

《佛國記》西譯研究與傳播（五）

許尤娜

參、十九—二十世紀《佛國記》的英譯與研究

一、《佛國記》第一個英譯本：萊德利據法文轉譯的《法顯的朝聖之旅》（一八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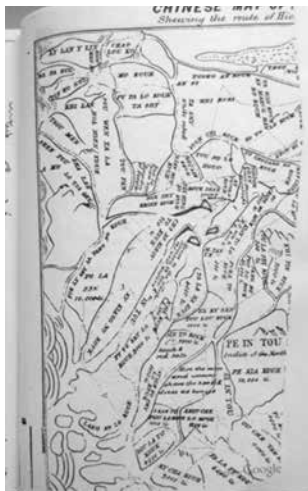
巴黎出版《佛國記譯注》十二年後，一八四八年在印度加爾各答出版了《佛國記》第一個英文譯注本，由萊德利（J.W. Laidley）依據雷慕沙法譯轉譯，全題為：The Pilgrimage of Fa Hian; from the French edition of the Foe Koue Ki of MM. Remusat, Klaproth, and Landresse. With additional notes and illustrations [by J.W. Laidley]直譯為：《法顯的朝聖之旅：譯自雷慕沙、克拉普羅斯及蘭德思《佛國記》法譯本，附新注解及圖表》。書末路線地圖一份、釋迦降胎圖（Incarnation of Sākya Muni）一張，及釋迦出生圖（Birth of Sākya Muni）一張，書影如下。

書前〈廣告〉（Advertisement）提到，編者原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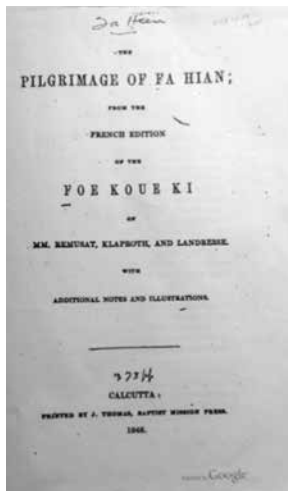
只想提供中文本文內容及少量對理解文本必要的注解；但是重新考慮此書主題、反思若刪略那些注解將大傷作品價值，因此決定：不僅保留博學法譯本的所有注解，甚至再加上一些補充與糾誤（依據Wilson, Lassen¹等人及編者自己長



J.W. Laidley附路線地圖（印度洋）



J.W. Laidley附路線地圖（中亞天竺）



J.W. Laidley英譯本（Calcutta, 1848）封面

（書影1：萊德利《法顯的朝聖之旅》（一八四八）封面、路線地圖）

時研究所獲。除了前幾章作一點點無傷大雅的濃縮和刪略，雷慕沙、克拉普羅斯和蘭德思的注解全數保留；而增補的篇幅約莫五十、六十頁。

編者保留了一個小節介紹他收集到的精采佛教思想，他深信作品目前的狀態（按：指英



釋迦牟尼出生圖



←↑→ J.W. Laidley英譯本
《法顯的朝聖》（Calcutta, 1848）附圖三張



釋迦牟尼乘白象降胎圖之一

（書影2：萊德利《法顯的朝聖之旅》（一八四八）附「釋迦降胎圖兩張及出生圖一張」）

譯）不僅對專業研究者有所裨益，對一般讀者也不失趣味性。他希望整合最新的印度出土遺跡，這是法譯時未易取得的資料。他預期：同一主題將有巨大進展，因此呼籲在中國的英國同胞，竭力搜集關於印度史地的中文著作，特別是像法顯、宋雲、惠生、玄奘等親履印度並寫下的行記，以讓專業漢學家將之英譯出版。

中文學界長期以來向以一八六九年畢爾《法顯及宋雲行記》為「第一個英文譯本」，筆者這裡特別將萊德利英譯本獨立列出，並整理書前簡短資訊，是為了突顯這種認知的失誤。專書如馮承鈞《中國之旅行家》、岑仲勉《佛遊天竺記考釋》（一九三四）、賀昌群《古代西域交通與法顯印度巡禮》（一九五六）、章巽《法顯傳校注》（一九八五）；以及單篇論文如靳生禾《〈佛國記〉在漢籍中的利用及中外之評述》（一九八五）、王邦維《法顯與法顯傳：研究史的考察》（二〇〇三），乃至筆者拙文《法顯〈佛國記〉在歐洲的傳譯：以英譯為中心》（二〇一三）都犯了相同失誤。

二〇一一年張艷〈《法顯傳》四個早期英譯版本的比較考察〉，²依三筆資料辨析出《佛國記》最早的英文譯本及英譯者之名。第一、一八七六年上海出版，普魯士漢學家穆德麟兄弟編寫的《中國書目提要》；

第二、一九四〇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發行的《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圖書 一九三二年以前館藏圖書目錄》；第三、一九八七年伊利阿德與亞當斯主編的《宗教百科全書》第五卷指出：「法文文本由萊德利翻譯成英文且附有新註解：標題為《法顯的朝聖之旅》」（The French text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additional notes by J.W. Laidley under the title The Pilgrimage of Fa Hian (Calcutta, 1848)。³張氏感歎目前尚無萊德利更多的生平與譯著資料，只能根據《法顯的朝聖之旅》由印度加爾各答浸信會教團出版部印行，推斷萊德利可能是一位在亞洲活動的浸信會傳教士。

對筆者而言，萊德利據法譯本轉譯的英文譯本，因為謹守法譯原貌，對於不諳法文的英文讀者，貢獻不宜小覷。換言之，作為第一個英譯本，出版於印度加爾各答，萊德利對於《佛國記》被西方世界所認識、傳播，功不可沒。一八六九年畢爾據中文而英譯的第一個真正英譯本中，亦特別在其〈序言〉慎重提到萊德利早有英譯。

二、據中文而作英譯：畢爾《法顯及宋雲行記》（一八六九）、翟理斯《佛國記》（一八七七）

萊德利依法文轉譯的《法顯的朝聖之旅》出版後二十一年，英國倫敦出版了畢爾依中文英譯的《法顯及宋雲行記》（*Travels of Fa-hsien and Sung-yun: 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 (A.D. 400 and A.D. 518 (London, 1869))。八年後，倫敦與上海同時出版翟理斯據中文而譯的英譯本《佛國記》（*Record of the Buddhist kingdom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H.A. Giles* (London: Trübner & CO.; Shanghai: Kelly & Walsh, 1877)）。再過九年，牛津出版理雅各《佛國記：漢僧法顯印度錫蘭求法行記》（A.D. 399-414）（*A Record of Buddhist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Fa-hie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 (A.D. 399-414) in *Search of the Buddhist Books of Disciplin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6)）。而二十一世紀，翟理斯在生命暮年再於劍橋出版其《佛國記》重譯本，題為《法顯行記》（A.D. 399-414）：《佛國記》（*The Travels of Fa-hsien* (A.D. 399-414), or *Record of the Buddhist kingdo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3)）。畢氏、翟氏和理氏三個英譯本各有獨到貢獻，筆者另有專文論述，對於譯文有較細

膩的討論，可以參看。⁴ 這裡主要依據各譯者之出版〈序言〉，略述四種英文譯本的特色。

（一）佛學家畢爾的《法顯及宋雲行記》（一八六九）

若依據翟理斯，畢爾《法顯及宋雲行記》以雷慕沙法譯為底本，「不但遵守了雷慕沙獨斷式的文本分章方式，而且還複製了雷慕沙的錯誤，甚至加入更多他自己的錯誤」。⁵ 一般學界認為，畢爾英譯，譯文品質不高，研究普通。但如同其《大唐西域記》英譯（一八八四），是嚴格定義下最早依漢文而作、真正的「英譯本」，故至今仍受西方及印度研究者重視。⁶ 筆者在此希望指出畢爾英譯本的三個未被闡明的特色。其一，書前致詞與引言；其二，合乎經緯與附有比例尺的法顯行跡地圖；其三，八頁〈序言〉及長達八十二頁的〈導言〉。

畢爾《法顯及宋雲行記》書前誌云：「謹將此書獻給家父：責任、慈愛、感恩。」次頁引Right Rev. P. Bigandet之讚詞：「令人震驚的是，我們終須認知這個事實：五世紀和七世紀兩位中國旅行家的旅程，不僅闡明了印度佛教的歷史地理，並且超越了目前於印度及鄰近國度的所有梵文與巴利文典籍之載記。」前者誌語顯示了譯者自我期許的三個價值觀；後者讚詞代表了譯者對《佛國記》作者與作品的崇敬心境。所附地圖〈法顯

穿行印度及中亞草圖〉相較萊德利版地圖，含經緯度更合於科學精確性，並將北天竺放大獨立列出。

至於〈導言〉，畢爾分作三部分：頁一—五十九（Index）為第I部分，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東傳中國、歷代發展直到清朝。在頁五十七提到明神宗（A.D.1530）曾試圖反佛，但朝中仍有上師、帝師。

而基督教傳教士於十六世紀末來到中國，強烈反對佛教的偶像崇拜；最顯著的例子是改信利瑪竇（Matthew Ricci）的徐光啓（Su-Kwang-Ki）撰文反佛、反祖先崇



S. Beal英譯本（一八六九）所附地圖（含經緯度）

S. Beal英譯本封面
（London: TRÜBNER & CO., 60, PATERNOSTER ROW, 1869）（微膠資料）

（書影五：畢爾《法顯及宋雲行記》（一八六九）封面、路線地圖（國家圖書館微膠資料））

拜。末段提到儒家、佛教思想在中國已然沒落，引理雅各之言佐證（頁五十九）；並云：由於漸失其宗教熱忱，佛教也逐漸失去其在人們心中的地位。「舊的信仰形式消失之際，我們可能，可以期待機會，將優於舊形式的信仰帶給他們。」（頁五十九）。

頁五十九—七十一（*xxxix-lxi*）為第II部分，述佛教基本教義四聖諦、大小乘發展、大乘思想特色（空性、心—物為一、多即一等）及其弘揚，法顯求法的時代背景與動機；特別提到法顯縱然鮮少暗示教義，但卻在耆闍崛山誦持大乘經典《首楞嚴經》：頁七十一—八十三（*lxi-lxxii*）為第II部分，較偏向史地考據，述法顯抵達印度時，天竺當地的佛教業已開始衰落，而透過北傳中亞與南傳錫蘭，在異邦得到弘揚。頁七十一—八十一，詳述法顯從于闐到烏菟國所行經地點行經地點及經緯座標，可在所附地圖按圖索驥。箇中引述多位歐洲學者的史地考成果，包涵布努夫、儒蓮、Turnour, Capt. Montgomery, Vivien de St. Martin, Klaproth等，並特別引古寧漢（Cunningham）對印度河上游懸索壁梯實察描寫，證法顯度蔥嶺、跨辛頭河之險（頁七十九—八十）。文末再度提到法顯於耆闍崛山誦持《首楞嚴經》之事，謂此經包含了最完整的祈求清單（

most complete list of Dharanis, invocations），綜括各種佛名和印度神祇名；以此推測此經最晚在紀元一世紀即已弘傳（頁八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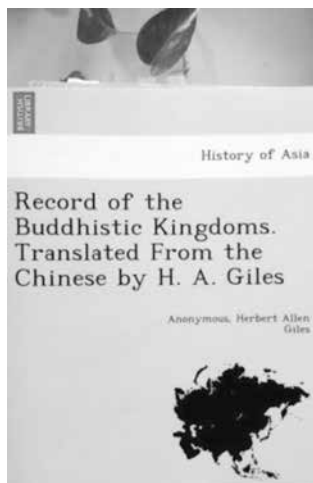
〈導言〉可以看出畢爾對中國的佛教信仰下過一定的工夫，然而角度有所局限；而這些認識背後，帶有宣揚西方「較優」基督教信仰的宗教意圖。此外，透過上面〈導言〉，筆者以為瓦特斯所謂「畢爾中文欠佳」之評，似乎有失偏頗。

（二）漢學家翟理斯的《佛國記》（一八七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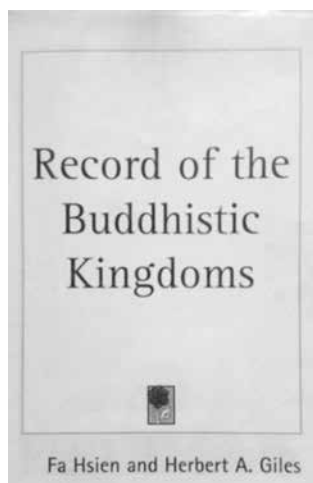
翟理斯初譯《佛國記》（Record of the Buddhist Kingdoms），年僅三十二歲，時任駐華外交官。他有意識地修正畢爾英譯不妥處，並在出版形式上展現其創意。書前有〈自序〉（Preface），另附一篇“Original Introduction”，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佛國記》英譯，但文末署名「佚名」（Anonymous）。書末有三篇附錄，分別是明代沈士龍、胡震亨〈書《佛國記》後〉二文英譯（頁一一九—一二四），及W. F. Meyers對第二十六章的英譯“translation of a passage XXXVI”（頁一二五—一二六）。

在編排上，既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作為文本《佛國記》之「介紹」，復以沈士龍、胡震亨代表中國的

研究觀點；最後再附另一位西方學者的章節英譯，筆者認為相當周延且具見識，也展現翟理斯對「在地觀點」（東方／漢人）的尊重。翟理斯慧眼獨具，發現整理出三篇明清文人對《佛國記》的評論，都是稀有且高價值的古典漢語文獻。翟理斯首先將之英譯以饗西方讀者。至於譯文疏漏之處，可以翟理斯四十六年後重譯時的反省作為作表：「一八七七年，我出版了一個新的譯本，對畢爾眾多明顯的錯誤處，進行了修正，但也留下了一些我自己的錯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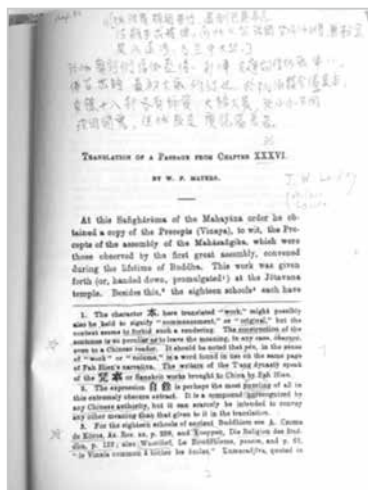


H.A. Giles 1877年英譯複印本封面之二（內頁另有標注：British Library, Historical Print Edi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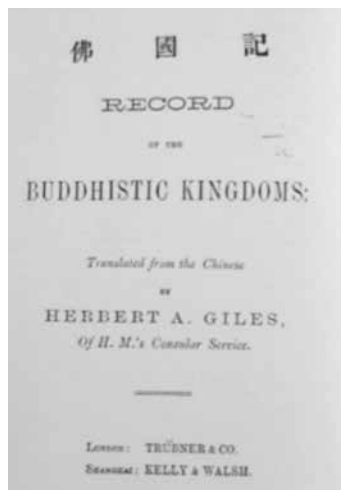


H.A. Giles 1877年英譯複印本封面之一（Fa Hsien and Herbert A. Giles）

筆者以為，翟理斯發現、注重胡震亨、沈士龍及《四庫全書提要》這三篇《佛國記》古典漢語評論，並將之英譯，附於英譯本，是其英譯本的重要貢獻，使英語讀者藉之得知《佛國記》在古典漢語中的評價。其中，沈士龍〈跋文〉直接品評「《伽藍記》雖翼翼婉秀，而三藏傳極為詳縟，要之不若《佛國記》玄致簡盡，不失晉人軌度」；以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六朝舊笈，流傳頗久，其敘述古雅，亦非後來行記所及」，都是



H.A. Giles (1877) 書後附 W.F. Mayres 對第36章（於此摩訶衍僧伽藍得一部律，是摩訶僧律……）英文譯注



H.A. Giles 1877年英譯本之內頁（London: TRUBNER & CO. SHANGHAI: KELLY & WALSH）

（書影六：翟理斯《佛國記》（一八七七）封面、扉頁及書末所附W.F. Mayers第三十六章譯文）

涉及文學價值的重要品鑑，可能引導或影響西方讀者對「竺國取經」作品的評價。下面是幾張書影。

翟理斯譯自中文的《佛國記》英文譯注出版之後二年，一八七九年，即有駐江西領事官瓦特斯，針對一八六九畢爾版和一八七七翟理斯版《佛國記》英譯優劣，作出詳細批評。〈法顯及其英譯者〉從一八七九年九月到一八八〇年五月，分五次連載於The China Review。⁸瓦特斯對中國文化及佛學有極高造詣，曾注釋玄奘《大唐西域記》，死後出版兩卷《玄奘的印度之旅》（一九〇四）。⁹在三十九歲所撰的這篇評論中，不但非常細膩對比評析前人譯作，並且具體給出自己的譯文。從《佛國記》第一章，幾乎逐篇、逐句、逐字，一一指出兩個英譯本不當處——包括原文認知及翻譯態度。光是《佛國記》前十六章的評析，就占五分之四篇幅，其中只有第十一章略而未評。¹⁰瓦特斯略過的，主要是印度歷史地理及佛教實況的段落；而他所集中討論的，一方面是東西方學界皆較陌生的天險書寫，特別是中亞沙河、葱嶺、辛頭河上游及小雪山一帶；另一方面，是文意理解，特別是佛教名相部分，如「無常苦空」及所謂「捨大戒還作沙彌」等。

這裡舉一段評論例示。在首次發表的篇章裡，瓦特

斯在頁底左欄附上這段中文：「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針對這段文字，他作了對兩位英譯者的評論、給出他自己的英譯、以及他理解原文的歷程：

在作者對這個（戈壁）沙漠的描述中，有一個段落，雷慕沙和我們兩位譯者所給的翻譯，似乎容有商議空間。取翟理斯為例，其譯文相較於畢爾，乃更為平實亦更為精確。我們讀到：「在這個沙漠裡，有很多惡鬼和熱風。任何遇到這（風）的人，無一倖存。」原文如下*：「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這當然應如是翻譯：「（戈壁）沙河充滿惡鬼熱風，任何遇到的人，無一倖存」。沒有理由將原文的「惡鬼」和「熱風」分開，而只讓後者具致命性。中國求法者相信：惡鬼能對旅人帶來致命的誘惑和威脅，而炙熱的沙塵風暴，也不遑多讓；前者可能還更甚於後者。難道不是惡鬼興起這熱風？難道駱駝及時的警告不足讓旅人預知熱風的到臨？可是面對這些可怕的惡鬼，人類的力量是無法攻克的。世上沒有什麼東西可制伏惡鬼的毒箭；沒什麼東西可以派

得上用場；不安的夜裡傳來駭人的聲響時，心也無法不害怕。唯有偉大的觀世音可以調伏這惡鬼的攻擊。¹¹（底線為筆者所加）

從上文，特別是筆者加底線處，可以歸納幾個重點：

第一、瓦特斯此文雖專注在「英譯」評論，其實亦兼及雷慕沙的「法譯」。

第二、在每個討論的段落中，瓦特斯會指出兩位英譯者孰優孰劣；以本段言之，瓦特斯明確指出翟理斯英譯勝於畢爾。而「（翟理斯）更為平實亦更為精確」這個評價，大致貫穿全文。

第三、兩位英譯者若皆「誤解」原文，瓦特斯會特別指出。以此段落為例，兩位譯者皆把句子的主詞生硬拆開；甚至把造成結果的「因」誤置！

第四、從上述評論可以看出，瓦特斯在理解原文時，有時會視文義加上原文所沒有的物件，例如，為法顯的沙漠行程，加入合理的「生物」——駱駝。法顯原文只說「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瓦特斯則指出其中隱而未言的沙漠「交通工具」。

第五，瓦特斯也為法顯「如何」通過致命的惡鬼熱

風，提出了詮釋：「唯有偉大的觀世音可以調伏這惡鬼的攻擊」。基於兩個理由，筆者認為這是瓦特斯一種創造性詮釋：第一，法顯此段原文雖不曾提及他「如何」

通過這些致命險難，然《佛國記》海路歸返一段，連續兩次海難，法顯都明言「唯一心歸命觀世音及漢地僧眾」；第二，在鳩摩羅什所譯《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裡的確有關於「惡鬼熱風」之沙漠險難的救護應許，例如「蚺蛇及蝮蠍，氣毒煙火然，念彼觀音力，循聲自迴去」，以及「或遇惡羅刹，毒龍諸鬼等，念彼觀音力，時悉不敢害」。蚺蛇蝮蠍、熱風毒氣、惡羅刹諸鬼，都是沙漠旅者常遇的具體險難，瓦特斯為讀者揭示法顯隱而未言的沙漠危難，以及他可能一心歸念觀世音菩薩才安全通過——此與他在歸程的海難亦可前後呼應。

以上瓦特斯沙河段落的評論，略可窺見：畢爾及翟理斯的英譯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而瓦特斯對兩位譯者的評斷「畢爾的中文欠佳；而翟理斯的佛學知識不足」，亦有其道理。由於兩種英譯都不甚理想，瓦特斯特作呼籲：「（歐洲）急需一個忠實，並有注釋與評論的譯本」。¹²

至於瓦特斯《佛國記》研究及其英譯，理雅各略有評論。在《佛國記·序言》中，理雅各盛譽瓦特斯那篇

評論之價值與啓發性；並指出：「如若瓦特斯先生出了自己的《佛國記》英譯，那就不需要再有人作翻譯了」。¹³

（未完待續）

註釋：

1. 第八章〈烏菴—佛足跡〉，第一個注解「烏菴國」含四十五—五十八頁，J.W.L.在頁四十六—四十七引Wilson (J.R.A.S.Vol. VII.pp.115,116) 從梵文名考據烏菴地理位置；頁五十四補充Lassen (Zur 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und Indeskythischen Koenig,p.144)；頁五十八又補充Capt. A. Cunningham (J.A.S Vol. XVII,pp.97,98) 的考古報告。
2. 張艷，〈《法顯傳》四個早期英譯版本的比較考察〉，〈福建農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二〇一一年第十四卷第六期（福州：福建農林大學），頁一〇九—一一。
3. 三筆書目原文及出版情況如下：第一，〈中國書目提要〉（Von Möllendorff P G, Von Möllendorff O F, Manual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Being a list of works and Essays Relating to China, Shanghai: The Oeslestial Empire Office,1876: p.26）：English by J.W. Laidley.

Calcutta,1848,vo.,and also in Charton's voyageurs anc. et mod. I,1862. 第二，〈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圖書1932年以前館藏圖書目錄〉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ed., Catalogue of Printed books Published before 1932, in th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London: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40: p.105）：第二，〈宗教百科全書〉第五卷指出(Eliade M, ADAMS C J.ed. The Encyclopedia of Region, Vol.5. London: MacMillan Reference Books,1987:p.246)

4. 參見拙文，〈法顯《佛國記》在歐洲的傳譯：以英譯為中心〉。

5. “Rémusat arbitrarily divided the text into chapters, and in this respect he was followed by Beal and Legge; but in the original the narrative is continuous, without break and without punctuation. Its style is terse and difficult, but not without a charm of its own”及“In 1869, the Rev. S. Beal produced an English translation, really of Rémusat's work, in which he reproduced all Rémusat's mistakes while adding many more of his own.”參見H. A. Giles 1923年重譯本的「書目說明」，頁xvii。

6. 參見王邦維，〈法顯與法顯傳：研究史的考察〉（二〇〇三），頁九十一—一〇〇。
7. 原文及出處詳本論文〈緒論·前人研究成果·域外法顯研究〉。
8. Thomas Watters, "Fa-hsien and his English Translators", 分五次連載發表在 *The China Review*, 從1879年九月到1880年五月, Vol. 8, No. 2, 1879.09到Vol. 8, No. 6, 1880.05。
9. Thomas Watters, *On Yuan Chwang's Travel in India*, London, 1904-1905。參見李四龍，〈歐美佛教學術史：西方佛教形象與學術源流〉（北京：北京大學，二〇〇九），頁二二二。另可參見（法）狄雍著，霍韜晦譯，〈歐美佛學研究小史〉（香港：佛教法住學會，一九八三年），頁六十三。
10. T. Watters 所討論及未討論的《佛國記》章節及內容主題，詳筆者拙文〈法顯《佛國記》在歐洲的傳譯〉。
11. T. Watters, "Fa-hsien and his English Translators", *The China Review*, Vol. 8, No. 2, 1879, p. 112.
12. T. Watters, "Fa-hsien and his English Translators", *The China Review*, Vol. 8, No. 2, 1879, pp. 107-108。
13. James Legge, *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Fa-hie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 (A.D. 399-414) in Search of the Buddhist Books of Discipline (Oxford, 1886) 書前 PREFACE, viii.

澄清湖畔將舉辦萬人點燈等活動

【本刊訊】澄清湖旁將舉辦萬人點燈、佛教藝術獻供讚頌音樂會，邀請青少年插花、抄經體驗多元法門。中華佛教護僧協會榮譽理事長圓塵法師，九月十三日率數十名法師長老於高雄市勞工育樂中心澄清會館宣傳活動，十月十四日將展出唐代真跡高仿古佛畫、陶藝文創、佛畫藝術展覽，並舉辦點燈、茶藝表演，展現佛教八萬四千法門。

圓塵法師表示，活動分兩場次，十四日上午八點半廣場獻供壇城，禮請諸山長老主持壇城灑淨儀式，以華嚴經偈頌祈請佛菩薩降壇加持，藝術團體圍繞主壇城獻藝，供養奉獻香、花、燈，下午三點舉辦禮讚三寶音樂會，邀青少年朋友與家人參加插花、拓印、抄經等闖關活動，體驗佛法。

在場法師表示，敬邀十方善信廣邀好友，共植圓滿福田，同霑法益。中華佛教護僧協會歷年頒發獎學金給南部學子，也曾為維護僧團，前往屏東縣政府聲援抗議團體，在南部地區相當活躍。